

略论异化社会中非异化的人^{*}

刘 金 联

对于什么是异化,以及异化的社会和异化的人的特征,国内外学术界已作了不少的研究和探讨。而对于异化社会里是否存在着非异化的人,如果存在着非异化的人的话,那么他的标志是什么,他在社会历史中究竟起什么作用等问题,至今还没有人进行研究。本文拟对此试作探讨。

—

异化社会中是否存在着非异化的人?对此,马克思的回答是肯定的,只是没有专门加以科学的论证罢了。马克思在评论欧仁·苏《巴黎的秘密》中的女主角玛丽花时指出:“尽管她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只有这些品质才能说明她怎样在非人的境遇中得以合乎人性的成长。”^①“玛丽花所理解的善与恶不是善与恶的抽象道德概念。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她不曾害过任何人。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太阳和花给她揭示了她自己的象太阳和花一样纯洁无瑕的天性。……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资产阶级的锁链脱去了,玛丽花可以自由地表露自己固有的天性,因此她流露出如此蓬勃的生趣、如此丰富的感受以及对大自然美的如此合乎人性的欣喜若狂。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她在社会中的境遇只不过伤害了她的本质的表皮,这种境遇大不了是一种歹运,而她本人则既不善,也不恶,就只是有人性。”^②

马克思肯定玛丽花在异化发展到极端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仍保持着人性,是因为“玛丽花把她的处境不是看做她自己自由创造的结果,不是看做她自己的表露,而是看做她不应该遭受的命运。这种不幸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③

后来,玛丽花在传教士的毒害下,还是被异化了,最终皈依了上帝,成了“自己有罪这种意识的奴隶。”^④但是,这只表明了非异化的人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变成异化的,而绝不意味着在异化的社会中不可能有非异化的人。玛丽花在被异化以前,毕竟是一个保持着完善人性的非异化的人,而不是异化的人。

在异化社会中存在着某些非异化的、保持完善人性的人,这是个经验的事实。鲁迅先生早就明确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⑤异化社会中存在着非异化的人,这种例子不胜枚举。马克思、恩格斯、鲁迅……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列举出历代非异化的人的事例,而在于从理论上阐明为什么在异化社

^{*} 本文的作者是该校哲学系77届学生,这是他的毕业论文。

会中会存在着某些非异化的人。

那么，异化社会中为什么会存在着非异化的人呢？

异化社会中之所以会存在着非异化的人，是因为“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⑤ 异化当然也不例外。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异化社会不仅存在着产生异化的物质条件，而且也为了扬弃异化逐步准备着物质条件。“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⑥ 正是因为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因素是同时增长的，异化为扬弃异化创造了条件，才使得异化社会必然存在着某些非异化的因素。如果我们否认这一点，那么就无法解释异化社会为什么会由一种形态过渡到另一种形态，也无法说明异化的历史性、暂时性。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的对立面。那么异化社会的对立面又是什么呢？这就是非异化的人。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质询：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异化作为一种特定的客观社会关系，谁又能不受它的影响呢？诚然，任何具体的人，都是生活在他所处的社会关系的天罗地网之中，不可能超越时代和历史，因而在异化社会中，不管他的主观愿望如何，他总会被打上或深或浅的异化烙印。不过，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非异化的人，并非指不受任何异化关系影响的人。任何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这也适用于异化的社会和非异化的人。异化的社会中有非异化的因素，非异化社会（如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也有异化的残余。在异化的人身上有非异化的一面，在非异化的人身上，也有异化的一面。二者的区别只不过是异化的程度不同罢了。量的差别可以造成质的差异。在异化的人身上，异化的因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相反地，在非异化的人身上，则是非异化的因素居于矛盾的首要地位。不仅如此，矛盾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由于一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异化的人可以转变为非异化的人，非异化的人也可能转变为异化的人。这主要取决于异化和非异化的因素在同一个人身上所处的不同地位。所以，异化社会中存在着非异化的人，正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在异化社会中的一种具体表现。

异化社会中之所以会产生某些非异化的人，还在于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能动的选择性。

大家知道，自由自觉是人的本质。人们虽然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存在，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却是能动的。异化虽然是异化社会的普遍现象，但异化社会中也同时存在着非异化的因素。人们在吸收客观存在的信息时，假若他恰恰注重的是非异化的因素，那么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异化的人。（当然，这种可能性极小，因此，异化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是异化的人。）异化社会是整体与个体相分裂，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相冲突的社会。在异化社会中，大多数人不可能认识到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因而只是片面地追求个人利益。只有极少数人才懂得，个人利益只能在共同利益中才能实现，因此他们选择了为共同利益奋斗的方向。前者的个体与整体相矛盾，后者的个体与整体基本上相统一。二者的区别则是异化的人与非异化的人的区别。

我们说人们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吸收有一种自由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否认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理。我们在承认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承认精神对存在的反作用以及体现在各个具体的人身上的主观能动性的差异。“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⑦

我们可以列举许许多多的事实来证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人的整个发展过程的重要影响和作用。许多家庭出身相同的人，甚至是孪生兄弟姊妹，在相同的环境里成长，但结果他们所走的人生道路却不尽相同。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同是留学日本，但后来前者成为新文化的旗手，后者却一度堕落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再如世界上伟大的女性燕妮，出身于德国著名的冯·威斯特法伦贵族家庭，身为男爵小姐，却不受金钱利禄的引诱，不怕贫困的威胁，毅然与马克思结为夫妻，并为他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变成贵族阶级的叛逆者。这说明了一个人的人生价值观、伦理观等主观因素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周总理曾经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具体运用。我们说异化社会中存在着一些非异化的人，不是说他们不受异化关系的影响，而是说他们能够不断克服异化因素，从而逐渐使自己成为一个非异化的人。

二

那么，怎样具体地规定非异化的人呢？

非异化的人的头一条标志，就是他的主要活动对自身不是否定而是肯定。马克思在《手稿》中分析劳动异化时曾经指出：“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怎么会同自己活动的产品象同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相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①劳动过程本身的异化主要是：这种劳动对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他在劳动中不是感到幸福和满足，而是感到痛苦。而非异化的人，其活动却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一种肯定自身的活动，他在这种活动中可以看到自身的力量，感到幸福和满足。譬如古罗马奴隶英雄斯巴达克领导的历时两年多的席卷意大利半岛的奴隶起义斗争，阿基米德在数学领域里所进行的科学探讨，莎士比亚在文学领域中进行的创作思维等，都属于这种非异化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非异化的人的第二条标志就是他作为异化社会的一员，不是屈从于外部异己力量的淫威，而是积极地反抗这种异己力量。当然，这里所说的屈从，不仅仅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从主观意识方面来说的。异化作为一种客观关系，不管你承不承认，仍然是与你的本质相对立的力量。正象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能掩饰他受欺凌、受屈辱、受压抑的困境一样，异化决非用心理上某种“超脱”就能扬弃。不过，我们也不能完全离开主观的、心理的因素。法国伟大的文豪雨果说过：假若一个人在思想上祈祷上帝，那么无论他身体的姿势如何，灵魂却总是双膝跪下的。没有起码的反抗异化的意识，没有对自己非人处境的愤怒和不平感，而是逆来顺受、麻木不仁，那就根本无从谈起什么反抗斗争了。当然，反抗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上。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只有从思想到行动都坚决反抗异化社会的人，才是非异化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是非异化的人，而且历史上一些奴隶英雄、农民领袖、资产阶级革命先驱，甚至某些作为新兴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说是非异化的人。尽管后者建立的并不是非异化的社会，但他们毕竟是旧的异化社会的叛逆者。

作为一个非异化的人，不仅必须具备上述二重规定性，而且还必须继承人类优秀的道德传统，具备人类优秀的思想品德。譬如对自由的热烈向往，对真理的执着追求，象屈原那样“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敢于抵制世俗的潮流，出污泥而不染，象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宁愿弃官归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呼吸“采菊东篱下”的自由空气，象诗人杜甫那样，怀抱着对祖国赤诚的爱，对人民深刻的同情，“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还有象文天祥那样敢于为正义和自

由而斗争，宁愿牺牲“自我”来换取民族的幸福，浩气凌云，谱写了一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生命颂歌。这些人虽身处逆境，却处处放射出真正人性的光辉！

三

在异化社会中，非异化的人虽属少数，但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却不可低估。

首先，非异化的人是变革社会的先驱。十七、十八世纪英法等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温斯菜坦、摩菜里、马布利、巴贝夫，十九世纪的圣西门、付立叶、欧文，以及俄国的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他们不惜流血牺牲为建立他们心目中认为真正合理的社会而战斗不息。尽管未能如愿以偿，但他们的历史贡献却是不容否认的。当然，我们说非异化的人是变革异化社会的先驱，并不是说一切变革社会的先驱都是非异化的人。譬如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等人，他们提出了“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仅仅是出于对反动的世袭血统论的否定；尽管他们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给予当时腐朽的社会以沉重的打击，这个行动本身具有非异化的性质。但从他们的口号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并没有摆脱皇权思想的羁绊。倘若他们夺取了政权，很可能也和刘邦一样称皇称帝。这就是他们异化的一面。而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和法国皇帝拿破仑这样的人物，尽管他们是变革社会的先驱，他们的身上也有非异化的因素，但总的来看，他们是凶恶残暴的，是异化的人。历史上非异化的人虽然是变革社会的先驱，但他们都不能建立真正的非异化的社会。这一历史的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完成。“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抗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⑩

其次，非异化的人担负着唤醒被异化的人的觉悟的责任。异化的人可以分为两类：异化别人的人和被别人异化的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了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⑪所谓被异化的人，就是指那些被统治、被压迫但又并未意识到自己这种非人的地位，或者是意识到了又不敢奋起反抗的人。鲁迅先生笔下“不幸而又争的阿Q”，正是这种被异化的人的典型。阿Q的一生是十分不幸的，受尽欺凌和侮辱。但是面对这种非人的处境，他不是积极地反抗，而是用逃避现实的自我解嘲，在精神上反败为胜的“精神胜利法”来欺骗自己。结果是一天天堕落、一天天消沉，最后带着那精神胜利的“法宝”，痛苦地离开了人间。非异化的人就是要用生活中血淋淋的事实来揭示人间的不平等，唤醒这些人沉睡了的灵魂，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迪被异化的人的麻木的神经，使被异化的人丧失了的人性，在自己身上得到复归，重新放射出光彩：范仲淹高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对那种唯利是图，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唯我主义者最有力的鞭笞；朱自清先生拍案而起，不吃美国人的“救济粮”，其浩然正气，激励着许多国人不甘屈辱，为自由而英勇奋斗。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塑造了人性复归的典型——聂赫留朵夫，不过他把聂赫留朵夫灵魂的复活，归结于宗教的力量和“天良”的启示。实际上，我们从许多现实的例子中可以发现，有些人之所以有灵魂的复活，除了自身的主观因素之外，还有“人性”的

感召作用，即他所处的环境中那些非异化的人的崇高品德的教育。

第三，非异化的人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方向。人类自身的发展，也是一个坎坷颠簸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一个辩证法的规律予以表明。人——异化的人——真正的人，这种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是同经济关系方面的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产主义公有制的辩证发展过程相一致的，并且前者是由后者所决定的。因此，马克思在《手稿》中反复谈到，只有消灭了私有财产，才能最终扬弃异化。马克思之所以把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史”，正是因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的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⑩我们所说的非异化的人，虽然诞生在异化社会之中，在他们的身上打下了一些异化的烙印，但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明天”。人类从自我异化逐渐走向非异化，这是历史的必然。

历史的发展往往总是要以暂时的倒退作为前进的阶梯，人和自然的异化则要通过人与自身的异化来消灭；进入自由王国要以不自主、不自由作为代价，这就是残酷无情的历史辩证法。黑格尔常常强调“道德上的恶的历史作用”，是不无道理的。异化，使得人的族类分裂，人自我分裂，使人成为“非人”，使人的历史留下了兽类的痕迹，这不能不说是令人痛心疾首的。然而，异化既然能够在历史上出现，那么它无疑也有自己存在的必然性。异化社会孕育了非异化的人，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这就为扬弃异化准备了物质条件。当异化社会进入资本主义这个充分成熟的形态时，扬弃异化的条件也就成熟了。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崭新的，非异化的社会的开始。尽管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某些异化的残迹，但这毕竟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把公有制社会发展得更加完善，那么异化将会最终在人类历史上消失！

注释：

①②③④⑩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15、216—217、216、223、45、44页

⑤ 鲁迅：《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了吗》。

⑥ 毛泽东：《加强互相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单行本第2页。

⑦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7、93页。

⑨ 毛泽东：《矛盾论》。

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